

古早兒童到現代兒童 日治學校兒童生活與樣貌

文／許佩賢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） 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幾歲到幾歲的人可以稱為兒童，是個嚴肅的歷史課題。從歷史上來看，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社會，對「兒童」的定義、觀點都不同，甚至有些人主張，某些時代或社會並沒有「兒童」的觀念，小孩出生後，只是被當作成為大人的準備期。當代的《兒童權利公約》將十八歲以下視為兒童，認為他們是需要被保障權利的對象。

那麼，在歷史上，臺灣社會怎麼思考「兒童」呢？我們可以想起許多關於「囡仔」的俗語，或許也可以視為古早臺灣社會的「兒童觀」。但無論如何，不可否認的是，日本治臺後引進近代學校體系，對臺灣的「兒童」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日治時期的報紙上很快就出現「學齡兒童」這樣的名詞，「兒童」逐漸變成指涉讀小學階段的兒童。學校的出現，確實大大改變了兒童的生活，也改變了社會的「兒童觀」。

學校是童年記憶的標尺

我們回憶童年往事時，很常用「幼稚園時如何如何」、「小學幾年級時如何如何」，而比較少用「幾歲的時候如何如何」。這是因為近代學校普及以後，將我們的人生用學校制度「規格化」了，學校經驗成為我們記憶過去的標尺。



▲ 1930年代大竹高公學校師生升旗。

不只是童年的記憶，我們每天、每週、每年的生活作息，也受到學校的功課表、行事曆規範，學校大大的影響了我們的時間感。每天幾點起床、幾點到學校，然後升旗朝會，接下來按表操課，幾點上課、下課，每一節上什麼課，中午吃飯午休，再接著下午的課程；然後打掃、回家，結束一天的行程。一個星期中，以星期幾有什麼課來安排每一天的行程；一年之中，配合學校的寒假、暑假、上下學期，區分為四段；學期中的日子，則在開學典禮、月考段考期末考、運動會、園遊會、合唱比賽等事先安排好的儀式性活動中度過。學校對時間的規範，不只是對上學的兒童有效，也連帶影響了有學齡兒童的家庭，隨著學校年限越來越長，影響的時間、範圍越來越擴散。

背起書包上學去

1923年出生於鹿港大戶人家的女

孩施素筠，五歲時進入當時鹿港唯一的幼稚園就讀。在幼稚園中學會唱日本兒歌、童謠，聽老師講日本或臺灣的故事，每天都很開心的上學。升上小學一年級後不久，跟著家人搬到臺北，轉入蓬萊女子公學校（現蓬萊國小）就讀。

從她小時候，家人就買日本小學館出版專門給小學生看的雜誌給她，裡面有很多幫忙複習學校功課的單元，她很喜歡看，因此，日文逐漸進步，學校的國語、算術、常識等課程都難不倒她。學校裡也有畫圖、音樂、縫紉、刺繡等課程，她特別喜歡裁縫課。她通常放學就回家聽唱片、看雜誌；有時假日和媽媽一起到城內逛街、吃東西，去菊元百貨搭電梯，也會去新高堂書店買月刊或童書，有時也去看馬戲團表演等。

五、六年級時，學校把想升學的學生集合在同一班，放學後把她們留下來加強課業。她們每天四點放學後先吃些點心，然後就練習一百題數學，之後練習寫國文、數學考卷，到七點左右才回家。大家都非常認真準備考試，後來果然全校都得到很好的成績。六年級時，她參加到日本內地參觀的畢業旅行，一路上印證了許多課本上的知識，也拍了許多照片，讓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施素筠公學校畢業後，順利考上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，後來也到日本留學學習洋裁，成為有名的裁縫老師。1930年代以後，像施素筠這樣，家境良好，父母受過現代教育，住在臺北都會區的兒童，他們的童年與當代兒童的日常

生活相去不遠，大多在學校的生活步調中，讀書、準備考試，假日則在逛街、休閒中度過。

不能上學的童年

施素筠入小學那一年（1929），臺灣人的學齡兒童就學率是31%；也就是說有2/3的兒童並沒有機會到學校就讀。從性別來看，男生就學率約46%，女生是15%，女童的就學率進展十分緩慢。那麼，沒有到學校就讀的兒童過著什麼樣的童年呢？或許我們可以用吳三連的童年經驗來想像一下。

吳三連，1899出生於臺南學甲，到他「學齡」時期，臺灣許多地方已經有公學校，但在農村地方，即使是「兒童」，也是家裡重要的勞動力，讓小孩去學校讀書，家裡就少了一個人幫忙；此外，家長們也未必喜歡日本人辦的學校，也不一定理解學校的必要性，他們有些人會認為如果真的要讀書，把小孩送去私塾（當時多稱為「書房」）學漢文，能夠幫忙寫信、記帳等才更有用。整體而言，日本統治時期，學齡兒童就學率雖然逐步上升，但是學校對許多兒童來說，仍然有不小



▲ 1926年，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「蕃童教育」海報，宣傳就學兒童與不就學兒童的差異。

的距離。

吳三連的父親是木匠，辛苦到處接工作賺錢，母親在家裡養豬貼補家用，家裡幾個年紀較長的哥哥都到城裡當學徒。吳三連年紀稍大後，就跟著村裡的小孩到村外撿拾枯枝乾葉回家當柴燒；有時到田裡捉田螺，或到各處無主的水塘裡去抓魚，去水溝抓泥鰍。偶爾釣得五斤十斤，便拿到附近較大的村落去賣幾分錢，再買幾條魚回家給家人吃。當收成或收割稻子的季節，他便到田裡去撿拾人家遺漏的甘藷或稻子換錢。這種撿甘藷、拾稻子、掃落葉、捉田螺、抓泥鰍的日子，占去了他童年歲月的大部分時光。在日治時期，有不少比例的兒童，尤其農村兒童，他們的童年可說大多是在幫忙生計的勞動中度過。

吳三連十三歲時，家裡的人覺得家族中沒有人識字，與官府交涉十分不利，還是讓他進入公學校就讀。吳三連也不負家人的期望，一路讀上去，還到日本留學，後來成為臺灣政治界、實業界的重要人物。

為兒童量身打造的世界

學校的出現與普及將臺灣兒童帶入新的世界，社會上開始出現許多專門以「兒童」為對象的商品或服務，象徵臺灣社會的「兒童觀」進入了新的階段。

1917年，一個名為吉川精馬的日本人在臺灣成立「臺灣兒童世界社」，發行《臺灣兒童世界》（日文原文為《臺灣子供世界》）雜誌，刊載寫給臺灣兒童的故事，也讓兒童投稿自己的作

文、繪畫，將得獎作品刊載在雜誌上。得獎作品中有很大比例是來自公學校兒童的作品，可見這不只是日本兒童的讀物，臺灣兒童也是很重要的雜誌目標群。1919年，吉川另外發行《學友》雜誌，以小、公學校四年級以上學生為目標對象，原《臺灣兒童世界》則設定在三年級以下兒童。1925年，臺灣最大報紙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也開設每週一次的「兒童新聞」版，刊載兒童投稿作品，不定期舉辦各種適合兒童的活動。

如同施素筠的故事所見，當時日本本國發行的兒童雜誌已流傳到臺灣，並且有一定的讀者群，但也有人開始留意到臺灣的兒童已經可以視為一群獨立的閱讀客群，需要為他們準備專屬的讀物，也提供他們發表自己作品的園地。

隨著消費社會的發展，以及社會上兒童觀的改變，報紙、雜誌上開始出現很多專門給兒童用的文具、服飾、玩具的廣告或購買指引。到城裡的百貨公司或熱鬧的街上選購書包、學用品，買合身的衣服，假日和家人一起到遊樂園、動物園玩耍，與當代社會的兒童生活相



▲兒童在總督府圖書館內自修。



▲幼稚園兒童穿著可愛洋裝、吊袋褲，跟老師在臺北新公園進行有趣的校外教學，1940年。（圖片出處：《彩繪李火增》，王佐榮編，蒼璧，2019）

似的生活節奏，也成為部分臺灣兒童的生活日常。

除了有兒童專屬的服飾、用品，兒童專屬的節日，臺灣家庭開始出現兒童專屬的房間，圖書館有兒童室，甚至兒童生病要看專門的小兒科，社會上開始出現許多專為兒童量身打造的服務。

兒童變成「少國民」

1941年，日本將全國的初等教育機關，包括臺灣的公學校、小學校，全部改為國民學校。國民學校令第一條宣示，國民學校以「鍊成少國民」為目的。「鍊成」的意思是鍊磨、育成，而「少國民」是年少的國民之意，也就是說要透過學校的鍛鍊、磨鍊，將兒童打造為能配合戰爭動員的未來國民。

國民學校中的日常作息出現了很大的變化，增加了各種儀式性的活動。朝會時，要向東京皇居方向朝拜，平常則被要求到學校附近的神社參拜；有些學校在校園內設置校內神社，甚至在教室內設置神棚，早晚由老師帶學生禮拜。

課本內容也做了大幅的修正，增加許多皇室相關的教材，或歷史上忠臣的故事，並增加許多與戰爭有關的課文，藉以提升兒童忠君愛國的精神，以及對戰爭的認同。除了精神上的認同之外，強化體能也成為此時期教育的重心。

隨著戰局的發展，學校兒童不只被動員去打掃神社，也被要求去整地建造機場；在校園附近的農地種植作物增加生產，或是種植蓖麻等軍用植物。兒童雖然不是直接被動員上戰場，但事實上也成為國家戰爭的工具，生活甚至生命受到極大的影響。

結語

近代學校帶給臺灣兒童全新的生活體驗，嶄新的教科書承載兒童對近代知識的嚮往，明亮的校園空間讓兒童可以自在快樂的學習，同窗學習的情誼為兒童開展了不同於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；但學校也規訓兒童的身體、時間觀，甚至在戰爭時期，將兒童視為國家戰爭的道具。回顧百年來臺灣兒童的學校生活，我們也一邊思考未來百年，我們希望為兒童提供什麼樣的生活。✎



▲戰爭時期國民學校兒童被動員去增加生產。